

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07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四十四辑 2009.6

黄有光 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翟华 克己复礼，走向低碳经济

王勇 从金融危机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荆林波 大国的学者心态

詹宇波 我的美国学生及其眼中的中国经济

聂辉华 哈佛经济系的研讨会

徐秋慧 追忆经济学诺奖逝水年华（下）

郑联盛 汉堡包与人民币升值

管清友 拯救美元？

陈宪 不能承受之重的出租车

高广春 中国房地产业：一头野驴

李华芳 邹至庄方案是否可行？

熊秉元 私利与公益的起承转合

邱斌 罗马的气质

荣敬本 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

吴崇伯 苏西洛欲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金砖第五国』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黄有光

《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总第42辑)的卷首语是李俊慧博士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学经济学?》。在论述学经济学不能赚钱,不能成为企业家,也不能经国济世后,李俊慧说:“我不知道别人的答案是什么,但我所见过的,我觉得最能反映我心声的一个回答,是英国著名的女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话:我学经济学,是为了不会受经济学家的骗!”

如果这个答案是对的,那么,经济学家不必存在,大家都不必浪费时间去学经济学,也不会受经济学家的骗!这样的世界应该会是更好的世界。是吗?

如果没有关于维持总需求的重要性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则在去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后,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很可能沿用1929年的政策,很可能现在全球已经处在比1929年经济危机更大的经济危机之中!

苏联与东欧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化,主要是受实际经验与比较的影响。然而,微观经济学、全局均衡理论与福祉经济学关于市场调节的功能,很可能也促进了这些转变。

同样的,国际经济学也促进了大体上互惠互利的世界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包括使中国在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中大大得利,增加其发展速度。

学会经济学未必能赚钱,未必能成为企业家,也未必能经国济世,这是对的,因为懂得经济学不是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而且不同人有不同的专长。例如,高智商的人往往情商比较低,数理好的人往往观察力比较低。很可能,学好经济学比较需要高智商与数理能力,往往很难同时能够具有企业家与经国济世者所需要的高情商与观察力,更不必说时间上的冲突了。

不过,经济学知识绝对是赚钱、成功经营企业与经国济世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让投资者、企业家与经国济世者雇用或咨询经济学家,应该会比较合理的安排。不然,为什么需要分工与专业化?

物理学家可能不会建桥,但是,没有物理学与数学的基础,就没有能够帮助我们建桥的工程学。



经济学家茶座

(第44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项目负责人

责任编辑

董新兴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雒亚龙

【卷首语】

黄有光 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001

【国是我见】

翟 华 克己复礼,走向低碳经济 /004

王 勇 从金融危机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007

宋小宁 别总拿个人所得税说事儿 /014

赵 刚 间谍也是生产力?(下) /019

曹安南 60年,在边缘 /024

【学界万象】

荆林波 大国的学者心态 /028

詹宇波 我的美国学生及其眼中的中国经济 /030

粟庆雄 早年留学的经验(下) /033

顾海兵 真正的大学选修课比重应在一半以上 /038

【学问聊斋】

聂辉华 哈佛经济系的研讨会 /042

徐秋慧 追忆经济学诺奖逝水年华(下) /046

朱富强 经济学奇才、怪才凡勃伦 /053

皮建才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 /057

刘福寿 “组织社会学”为什么忘了“社会”? /061

高明华 创新能力与创新欲望
——“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065

【生活中的经济学】

郑联盛 汉堡包与人民币升值 /068

陈惠雄 山青水不绿:人地关系演化中的新公地悲剧 /073

王跃生 供求规律与文化市场的繁荣 /078

胡海鸥 不变甚至比多变重要得多 /081

【经济随笔】

- 管清友 拯救美元? /084
俞炜华 人类婚姻的未来 /089
李文溥 开平碉楼 /092
孙大鹏 善恶环境论与企业文化 /096

【经济评论】

- 陈 宪 不能承受之重的出租车 /099
高广春 中国房地产业:一头野驴 /104
赵红军 亏本的生意有人做 /109
冯维江 流动性与社会成本 /112
封 进 劳动合同法与大学生实习 /115
陆 铭 为什么要把劳动者变成资本家? /118

【并非清谈】

- 李华芳 邹至庄方案是否可行? /121
邹至庄 怎样推行实事求是的精神 /124
黄有光 诺奖得主的失误及对环保大业的可能危害
——科斯打破对拥挤与污染课税的庇古传统了吗? /126

【熊出没注意】

- 熊秉元 私利与公益的起承转合 /129

【经济史话】

- 祝曙光 铁路把日本带入近代社会 /131

【他山之石】

- 邱 斌 罗马的气质 /135
荣敬本 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 /138
吴崇伯 苏西洛欲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金砖第五国” /145
詹小洪 韩国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 /150
赵世勇 感受美国的劳动力成本 /152
李仁君 在日本体验节约型社会 /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44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09-05142-2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

-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第001222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012

E-mail: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172毫米×232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4.00元



克己复礼，走向低碳经济

翟 华 *

记得第一次听到“二氧化碳”这个词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1968年元旦的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我这才知道人的这一呼一吸，进来的是氧气，出去的是二氧化碳。几年后再接触到二氧化碳这个概念就是在化学课上了，凡是含碳的有机物在燃烧过程中都会产生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那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这种看不见闻不出的气体竟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今谁要是不知道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为何物，那肯定是“凹凸”(out)了。

然而，目前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多从能源供应端出发，从技术进步着眼促进开发无碳的可再生新能源。但是，在我看来，发展低碳经济更重要的是要从消费端着眼，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研究一下人自身的需求，采取相应的对策。

说到人的需求，不能不提到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社交需求”(Social needs)、“尊重需求”(Esteem)和“自我实现需求”(Self-actualization)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求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最高层次，如果最低层次是所有的人的起点的话，能够上到下一层次的人只能是一部分，到了最高一层那就是传说中的“成功人士”了。

按照每层人数依次递减的趋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可以大致看做是一个金字塔。食物是最重要的生理需求，而食物的烹饪需要燃料(比如天然气、电等)，这就是与生理需求相关的基本能源需求。在此基础上，照明、暖气、冰箱等的能耗可以看做等同于与安全相关的能源需求。再往上走一步，社交需求意味着人们需要出门走动，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会越走越远(正如赵本山在小品中所说的，“等有钱了，去大城市旅旅游——上趟铁岭”)，这就产生了公共交通的能耗。在满足尊重需求这个层次上，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穿得体的，穿得体的要点是“反季”——夏天穿毛衣，冬天穿单衣(按照某时尚杂志的要求，女士尤其不可穿秋裤)，反正出来进去不是在小车里，就是在房间里，都有四季如春的舒适温度。至于达到了自我实现需求境界的

*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能源专家，能源经济博士。

少数“成功人士”，上面提到所有能源消耗需求一个不能少，而且再放大至少 N 倍——住豪华别墅，开高档轿车，打“飞的”乘一等舱。

需求层次与能源消耗直接相关，而能源消耗又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直接相关，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可以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依次排开，达到“自我实现”这个层次的精英们毫无例外都是“高能耗、高排放”的“双高”人士。粗略估算一下，在中国现有的能源结构下，一位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最底部（满足生理需求）的普通百姓，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不会超过 0.20 吨；而一位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最高点的中国精英单是乘飞机去一趟美国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达到差不多 2 吨。顺便说一句，日本全日航空公司为了减少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曾试行要求乘客登机前如厕排空的办法。据估算，如果有一半的乘客在登机前如厕排空，那么飞机每月可减少约 4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把各个国家比作个人，也同样是层次分明：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底部，低收入国家(low income countries)大致处于满足安全需要的层次，中低收入国家(lowe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处于“社交需求”的层次，中高收入国家(highe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处于“尊重需求”的层次，而高收入国家(high income countries)就是“自我实现”的层次了。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国，还处于“社交需求”的层次，而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早已登上了“自我实现”的塔尖。按照美国能源部的匡算，亚洲和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到 0.2 吨，低收入国家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 吨左右，中低收入国家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3~4 吨，中高收入国家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7~8 吨，而高收入国家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0 吨左右，而美国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则高达 20 吨。这些数据只是各国的人均排放量，在每个国家的范围内，当然还是可以按照马斯洛的理论把本国居民的二氧化碳从满足“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排成若干层次。可以想象，在那些“自我实现”的国家内达到了“自我实现”层次的精英，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达到惊人的程度。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为“在创造以及传递有关人为气候变化知识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需要的各种度量上所打下的坚实基础”获得 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作为一位“自我实现”的成功人士，戈尔在田纳西州拥有一幢豪华的别墅，有 20 个房间，外加一个游泳池，2006 年耗电量高达 22 万度，远远超出美国每年户均耗电 1 万度的水平。估算一下，戈尔在田纳西州的这座大宅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 120 吨！戈尔办公室发言人对此自然有个说法，他表示前副总统已经通过当地的“绿色电力转换”项目机制购买了碳排放的额度，花钱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太阳能、风能等无碳新能源项目，作为对自己一家高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补偿。

分析一下戈尔“碳交易”的实质，我们看到戈尔固然出资扶持了新能源的发展，但是同时他也为自己的高排放买了“良民证”。然而，有限的新能源往往只能满足部分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底层的基本能源需求，而处于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们依然可以维持“双高”的生活方式。所以，碳



交易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能源的发展,但这个机制的基本思路依然在“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在经济上都要赶英超美,而每个人又要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塔尖努力,成为“自我实现”的“精英”。在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下,能源的消费依然会持续增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不可能降下来。所以,试图以“增加供应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的传统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举个例子来说,我去过亚非欧美许多国家的许多大城市,解决交通拥堵各家有各家的高招,但无论是拓宽道路,修建环路还是立交桥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路修得多,对消费者购买新车欲望无异于一种鼓励,所以上路的汽车也越来越多,能耗和排放也随之不断攀升。长此以往,总有一天城市就蜕变为一座大停车场,到那时只怕是人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吸进来的也多是二氧化碳了。按照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先生的估计,世界各国如果都按照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去发展、去生活的话,100年以后需要四个地球才够人类生存。目前的碳交易机制以及技术进步也许可以延缓这一进程,但是无法改变在二氧化碳阴影笼罩下的地球所面临的绝境。

在我看来,全球的气候变化了,人们的主流价值观也必须随之变化,这是走出绝境实现低碳经济的唯一路径。2009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项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决议案,决议中特别提到“孔夫子倡导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以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正和道义,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美国人对孔子的推崇,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和回归,有望成为“普世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天人合一”,凡事顺其自然。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人们固然还会有马斯洛所描述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但是在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中,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不应该随之水涨船高。

新时代的成功人士应该是“谋道不谋食”的君子,讲求“克己复礼”,“克己”是要克制自己消费欲望的无限膨胀,而“复礼”则是要求其能耗与碳排放量应该与满足基本生理和安全需求的平均水平相当。这正是美国众议院所推崇的“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说到道德,记得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这样说过:“我比乔治·华盛顿的道德水准更高:他不可说谎;我可以,但我就是不说谎。”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就应该达到马克·吐温这样的境界:我可以有高消费的能力,但是我绝不可以有浪费的行为。这样的人不仅是一位乐善好施的“良民”,更是一位返璞归真的“达人”,达到了“自我实现”的最高点。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克己复礼”、道法自然,那么整个国家乃至世界走向“低碳经济”也就自然而然了。

从金融危机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王 勇*

2008年至今的这次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真实经济,而且对于经济学术界的震撼也是巨大的。2008年经济学诺奖得主 Paul Krugman 在《纽约时报》上毫不留情地将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发展定性为“黑暗时代”,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连同新凯恩斯主义,都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并且呼吁重返传统经典凯恩斯主义的萧条经济学,倡导对诸如 animal spirit 的重新审视乃至对于整个宏观与金融的全面的为经济学思考。芝加哥大学的 John Cochrane 则撰写长文予以反击,指责 Krugman 对新近20年宏观经济学进展的无知和片面理解,还顺便为自己的岳父 Eugene Fama 所倡导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辩护^①。而作为新古典宏观的旗帜性人物,芝大的 Robert Lucas 亦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再次力挺“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对于美联储主席 Ben Bernanke 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而且继续支持在芝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Fama,辩护说这次金融危机恰恰证明了金融市场价格的确已经包含了当时市场所能够掌握的全部有效信息,所以才会使得所有的经济学家中几乎没有谁能够准确预测到这次危机的来临和如此之大的灾难性。Lucas 不无调侃地说,即便真的存在这样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付不起工资给他!

由此联想到在危机之前不久,哈佛大学的 Gregory Mankiw 就与明尼苏达大学的 V.V. Chari 等人发生一场争论,前者认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对于实际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和影响,而后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一举例认为过去30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面对宏观经济学家内部的这些争论,孰是孰非,大家莫衷一是。其中最激进的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又发“经济学并非科学”之论。笔者对此实难苟同。因为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是坚持同样的经济逻辑推理和同样的实证原则,最主要的分歧根源只是在于对以下问题的判断上:究竟什么才是更合理的理解并预测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假设起点。这种分歧只是反映了这门学科分支本身的年轻与发展的不成熟,正如天体物理中仍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学科本身的科学性。

*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顾问。

① 顺便说一句,有不少人误以为 Cochrane 是新古典宏观的,其实他本人是将自己定位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笔者也选修过他在芝大商学院教的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经济学课程。



另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非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则似乎有点“幸灾乐祸”:瞧他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家,尽搞些不切实际的假设诸如“代表性家庭户”、“自愿失业”、“菜单成本”,而且还学人家工程学的那一套,又是 HP 滤波,又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又是脉冲响应,又是 very awful regression 的 VAR,搞得好像很科学的样子,到头来还不是面对危机无能为力,预测就更没有办法做到。

诚然,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有很多时候为了 tractability 而常常采用各种简化假设,有不少模型的结论也的确被证明与现实不符合,但是这些情况与经济学中任何其他实证研究的分支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最重要的是:What is the best alternative? 对于现有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虽然有时候领域之外的高人可能看得更真切,但是在专业化分工如此细致的今天,宏观经济学家通常要比其他分支的经济学家对本分支的局限与不足了解得更加深刻和具体。一味地单纯批评现有状况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创新的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事实上,据笔者了解,这似乎也是绝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对于 Krugman 檄文的共识性意见:很遗憾,Krugman 并没有说出任何一条宏观经济学家们所不知道的新的批评或者是有创见的新建议,所以不必太在意。

那我们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究竟能从这次危机中新学到一些什么?难道这次危机又只是 RBC 理论中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外生不可理解的冲击?这显然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有不少经济学家对此发表了看法,显然是众说纷纭。笔者自己的研究领域正好就是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加上本学期正好需要讲授国际经济学课程,所以不敢不对此问题也加以思考。本文试图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和阅读,对这次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带给笔者个人的启示和思考做一次自我总结,这也许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吧。

启示一:金融制度结构需要更有效地被纳入宏观经济学基础模型

在新古典宏观模型中通常假定资本市场是完备的、有效的(部分基于 MM 定理和货币中性,以及有效金融市场等理论和实证研究),所以一切金融结构问题就直接被抽象掉了。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比较容易忽视金融与资本市场结构的问题。而在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模型中,各种价格或者信息的黏性会导致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的实质影响,尽管主要是短期的。另外资本与金融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不完全也经常会于异质性经济人动态模型中通过借贷约束或者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只有在不完美市场或者策略性宏观经济行为中才会发生作用,而市场的不完美性以及现实中宏观主体策略行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是可能会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宏观经济的发展阶段和结构性特点考虑进来。特别是一旦涉及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我们就不能再心安理得毫无顾忌地使用完美资本市场的假设,或者照搬教科书中的那几个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而必须了解现实经济中最重要的实际制度约束是什么,了解实际的产业结构和实际的金融结构的特点是什么,了解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实际传导机制是什么。

最近,林毅夫教授、鞠建东教授与笔者构造了一个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试图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①。所以如果假设穷国和富国拥有相同的产业结构(比如具有相同的总体生产函数形式),我们就会忽视掉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最优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差别而提出误导性的宏观与产业政策。既然最优的产业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产业对于金融市场的需求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最优的金融制度结构也是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演化的。我们目前正试图模型化这一点。既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结构特点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必须将这种金融制度结构的多样化和内生性特点有效地引入我们的宏观模型中。

启示二:金融市场是否应该监管以及 如何加强监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次金融危机直接起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缺乏对金融市场必要的监管是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批评市场经济过于自由放任,呼吁要加强政府管制。从事后来看,这次危机的确存在着信贷过于放松的问题,很多人甚至将原因归结到美联储前主席 Alan Greenspan 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John Taylor (2009)认为美联储在此次危机前仍然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没有能够坚持 Taylor Rule,导致实际利率严重偏低。Robert Mundell 最近则批评美联储的汇率政策。

由于金融技术的高速创新,广大投资者和市场对于某些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的风险评估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的误差。Diamond 与 Rajan (2009)认为这次危机之

① 参见 Ju, Lin and Wang, 2009, Endowment Structure,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前,对以 mortgage-backed loan 等为基础的新型投资的高回报率,无论是监管者还是市场参与者。都搞不清楚这究竟是因为那些聪明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能力强还是只是反映了高风险投资所必需的风险溢价。而投资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投资经理的个人回报主要取决于短期的盈利能力。这些技术和激励因素,再加上整个金融监管的缺位加起来就导致了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积累最后爆发危机。

加强政府管制事后看似乎的确很有道理,但是怎么加强?怎么在事前就保证金融监管部门就一定比市场更有先知先觉?这一点并不明显。如果政府对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投资工具的风险特性也同样没有经验和准确的评估,甚至比市场本身掌握的信息还要少,那么监管者究竟该怎么监管^①?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如何选择监管变量?如何把握监管力度?会不会导致过分监管而使得真实经济的融资能力和创新激励受到严重影响?

有些学者借此下结论主张中国的金融发展要进一步监管,但笔者想提请注意几个潜在的“选择性偏误”的问题。第一,我们不能对经济运行良好时的金融市场化政策的潜在正面作用视而不见,而只是挑在出问题的时候说事。第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在金融市场建设上的主要矛盾可能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目前的中国,在防范金融危机的同时,必须更加放松对中小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限制。该监管的监管,敢放松的放松,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启示三:中国不应该立即开放资本账户

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使得这次危机迅速从美国波及全球。有学者指责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称中国的人为控制的低汇率和贸易的巨大顺差导致了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和资本流入这种全球的不平衡得以长期维持,进而触发了这次危机。对此问题,笔者希望日后能专文讨论,这里只想就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阐述自己的看法。

对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经济学家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利大于弊。但是对于金融的全球化却仍然褒贬不一^②。金融全球化的好处,理论上主要是能够使得各国之间可以分担风险,并使得金融资本能够在全世界范围更加有效地配置,提高总体的回报率。但是主要挑战在于,金融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会因此提高。这是因为,与国

^① 在学术界很难找到比 Bernanke 更懂得危机理论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且很难相信有人会来自华尔街的财长 Paulson 更加熟悉实际的金融界操作。即便这样,他们的政策还是饱受批评。

^② 参见 Kose, Prasad, Rogoff and Wei (2006), Obstfeld (2009), Mishkin (2006)。

际货物贸易的同期(或者几乎同期)交换特征不同,金融资产的国家间交易更多地涉及跨期交换,所以更容易受到预期、commitment 等一系列动态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更大。另外,金融资本的每一笔交易的转移速度和流动规模通常远远超过商品与服务贸易,这种潜在的高频高幅的资源移动能力很容易冲击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小国。第三,金融安全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不同于市场上的一家小公司的破产倒闭,如果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和巨额资本外逃,就会对整个经济体的所有经济活动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

笔者认同中国目前全面开放资本账户的时机并没有成熟。主要理由如下:(一)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不够健康和稳健。(二)中国的养老保障和社会保险体系还没有完善。(三)中国的宏观经济需求结构仍然不够合理。(四)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与个人收入不平等还比较严重。所以如果现在就贸然立即开放资本账户,就有可能直接冲垮中国现有的银行体系,放大股市和房地产的震荡,并且使得政府失去很多现有的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经验,届时在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双重冲击下,一旦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引发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中国参考的国际经验是 1980 年代日本的情况。当时日本对美国也是具有高额的贸易顺差,美国政府也对日本施加影响,逼迫日元升值。日本的高增长也是主要依赖出口,而日本国内当时的银行体系也有着各种弊端,后来日本将贸易顺差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大量转移到美国,生产汽车并且投资于房地产。随着日元的被迫升值和贸易顺差的下降,到了 90 年代发生了日本经济的十几年的萧条。虽然中日情况有所不同,但中国应该引以为鉴,居安思危。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认同市场化改革的主导方向就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将国际资本账户一次性地全面开放。在保持稳定和不断学习中渐进地改革,这似乎更为可取。

启示四:经济研究和政策建议应基于事实与推理而非意识形态

在笔者看来,经济学是科学,不应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只是政治层面的,还包括经济学领域内的“主流想法”与思维惯性。Krugman 那篇文章批评宏观经济学家们常常将模型中的数学美感混同于现实情况。这一点是深刻的,也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地方。

笔者不禁扪心自问: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现有理论模型来看世界,而不是从现有世界来看理论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对 Krugman 文章观点的反应是由于受到北大老师们的先验影响而非经过自己大脑独立认真思考过的?笔者非常认同林毅夫

教授的观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评判的标准应该是内在逻辑的自洽性以及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①。但在实际分析中,笔者自己常常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比如,笔者几年前写的随笔《我被“芝加哥化”了?》就有一些观点其实是带有某种宗教性质的迷信的^②。不能因为和某些经济学大家比较亲近,就盲目地全盘接受对方的所有学术观点。不得不承认,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价,对于金融问题重要性的看法,对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判断,笔者现在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决绝地自信了。

非常遗憾,由意识形态引导的非独立思考的言论在各种分析和媒体报道中也比比皆是。比如有不少经济学家盲目断定民主总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问其原因,答曰最发达的经济基本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民主讲人权所以是好的。这是典型的由意识形态代替逻辑推理与实证检验的非科学的思考方式。事实上,Robert Barro(1996,1999)以及 Daron Acemoglu 等(2008)在对民主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极为细致和认真的实证考察后,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特别显著的相关性。这在其他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普遍支持。事实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可能是非单调的。毫无疑问,民主本身具有其独立的重要价值,但是这一点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对于经济增长就必定是有正面促进作用的,需要深入的科学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另一种在中国内地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舆论”主导经济观点。例如,对富人征收高的收入税的确就是在变相地对投资征税,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单纯“杀富”不能达到长期“济贫”之目的。这是经济学推理的大实话。但是拿到公共论坛上就会马上受到“为资本家代言、被富人收买的”的批评。其实,广大网民大多只是反对那些通过违法犯罪致富的行为,而那个问题则应该通过加强法制严惩犯罪加以解决,虽然执行起来有现实难度,但和收入税本身的制定完全是两码事。诸如此类。

启示五:策略性宏观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的内生性

如果翻开 Mankiw 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或者是 Paul Krugman 与 Maurice Obstfeld 合写的《国际经济学》教材,我们会发现,以往各次经济危机之间的那种表面上的高度相似性令人惊讶:先是经济一派繁荣,但是贸易与财政赤字显著,然后突然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大跌,银行面临挤兑风险紧缩信贷,大公司破产,失业增

① 参见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该文修改稿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34辑。

加,消费与投资低迷。

标准的新古典宏观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有行为都由价格信号来指导,所以内生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比较平滑,因为预期是理性的,市场是完备的,而消费者是希望消费平滑的。所以,如果要解释危机中内生变量的急剧变化,就需要主要依赖于引入外生的足够大的各种冲击。虽然这也许可以在事后用来解释危机的后果,但是事前很难用来预测危机的发生,更不能分析如何防范危机。要能完整地解释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似乎需要至少明确地引入更加具体的金融市场的特征,同时必须对人们的预期与信息加以模型化。金融市场行为对于预期和公众信心非常敏感,同时各种金融机构之间又高度 leveraged,“追涨杀跌”的投资行为与产品市场上通常的需求定律正好是相反的,是反稳定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金融市场均衡的稳定性比较低。当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系统的风险因素就常常会主导回报率而成为投资者行为的主要考虑因素。无论是由于基本面的恶化而导致真正的泡沫破裂,还是因为纯粹“太阳黑子”式的自我实现的危机均衡,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所有价格下跌,因此价格本身几乎已经失去了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指导作用,而只是被动承载市场在每一个时点上的集体预期。此时,作为没有明确量化的信心和互相之间的预期则成为主要的投资行为依据,换言之,此时的市场是博弈策略行为而不是通常的价格行为了。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觉得,要理解金融危机,我们就需要考虑策略性宏观行为与价格行为之间的内生转换关系。在我们的宏观模型中,博弈论应该与一般均衡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研究这个过程中不对称信息或者异质信念所引发的贝耶斯行为。

另外,面对危机,政府与央行都会采取各种政策,而公众以及投资者在考虑自己最优策略函数的时候也的确是基于对各种 reactive 的 discretionary 的宏观政策的预期的。另一方面,政策当局在考虑政策制定时也需要将预期的公众行为考虑进来,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预期。这就使得分析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具有策略性。

这些还不是全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对危机需要各国政府的合作与协调。这就常常涉及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往往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换言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开放经济之间的互动,而且必须将政府的目标和行为考虑进来。这些都说明,很多政策并不是像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那样外生给定,而是内生的,需要研究政策如何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过程。



别总拿个人所得税说事儿

宋小宁*

个税“起征点”要不要大幅提高？“起征点”提高有利于低收入者吗？个人所得税要不要实行指数化？是否要实行综合税制模式？这些常常激起大家强烈兴趣的问题常常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济学家、网民、记者等人士拿来说事儿，围绕这些问题的鼓动、争论、论证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此本文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征管条件、国际比较等方面厘清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片面模糊认识。

一、个人所得税的现状与功能定位

税收的功能主要在于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运行，个人所得税还具有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在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公众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仇富”心理的情况下，大家期望个人所得税能够调节收入分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筹集财政收入而言，1994年新税制实施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稳步增长，是收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2008年的个人所得税达到3722亿元，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4%，目前已成为第四大税种，在部分地区已跃居地方税收收入的第二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税收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全社会纳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个人所得税收入和所占比重将会进一步提高。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地方财力匮乏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成为地方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就调节收入分配而言，个人所得税主要调节劳动所得收入，但是我国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并且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主要源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和其他制度性障碍。此外，高收入者常常有多种收入来源，因此税收筹划的空间较大，再加上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不高，导致高收入者常常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是比较微弱的，我们不能在此对个人所得税均贫富寄予太大的希望。

因此，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应该还是主要为地方政

* 作者系厦门大学财政系博士生。

府筹集财政收入,至于调节收入分配,应该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来实现,而不能盲目地依赖个人所得税。明确了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之后,就可以厘清目前围绕个人所得税的几个主要问题了。

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要不要提高?

提高“起征点”是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和网民的最为集中的提议和观点,有人建议提高到 5000 元,也有人建议提高到 8000 元。“起征点”是个人所得税中最为简单易懂的一个税制要素,容易为大家理解,于是大家纷纷拿此说事儿。然而,即使在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上,大家还是犯了常识错误。“起征点”与“免征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起征点,是征税对象达到征税数额开始征税的界限,即一旦征税对象的数额达到或超过起征点时,就要对其全部的数额征税,而不是仅对其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征税;而免征额是在征税对象总额中免予征税的数额,只对超过免征额部分征税。大家关注的起征点实质应是免征额,而且只是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薪资金费用所得的免征额问题。

“免征额”代表的个人生活、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的是成本和费用,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免征额应该相应调整。免征额确定的标准除了成本费用之外,还往往与一国的个人所得税定位有关。当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对少数富人的收入进行调节的时候,免征额往往定得较高。而当个人所得税成为一个对多数人的所得进行调节的税种之后,免征额常常定位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美国为例,1913 年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 3000 美元,换算成 2005 年的美元是 57000 美元,如此高的免征额,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随着美国将个人所得税视为一种财政收入工具,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扩大了。以 2005 年为例,免征额仅为 3200 美元。中国个人所得税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80 年,多数人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元,根本够不上 800 元的免征额,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纵然免征额提高了,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大大超过了 1980 年的水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主要担负了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因此免征额的调整就受制于财政收入约束。如果免征额调高到 5000 元,二线城市个人所得税会大幅减少,三线城市和县城的个税基本就绝收了。

三、免征额提高有利于低收入者吗?

表面上看,免征额提高之后,低收入者缴纳的税少了,税负会降低。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群体主要是中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基



本不纳税。2008 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29229 元,即 2435 元/月,扣除 2000 元的费用扣除标准和“三险一金”约 500 元,这一工资水平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2500 元大约是 985 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个群体都几乎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负担群体主要是中高收入者。

如果目前大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受惠多的也是中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利益反而会相对受损。这是因为,扣除标准的提高会使高收入者面临的几个纳税级次同时降低,而中低收入者通常仅面临一个或两个纳税级次。举例而言,将扣除标准提高至 3000 元/月,月薪为 5000 元的纳税人税负只能减少 100 元/月,而月薪为 10 万元的纳税人税负减少 350 元/月;将扣除标准提高至 5000 元/月,月薪为 5000 元的纳税人受惠 175 元/月,而月薪为 10 万元的纳税人受惠 1050 元/月;将扣除标准提高至 10000 元/月,月薪为 5000 元的纳税人仍然只受惠 175 元/月,而月薪为 10 万元的纳税人受惠 2800 元/月。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征收的收入主要用于补助弱势群体等,如果扣除额提高过多,高收入者交税大量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也就减少,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以及社保、教育、医疗等支出也都会受影响。因此,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不仅不能得益,反而会利益相对受损。

四、个人所得税要不要实行指数化?

税收指数化是指将个人所得税税制中的免税额、扣除额和级距等按照与通货膨胀率紧密相关的经济指标进行指数化调整。由于个人所得税是以名义收入水平为基础进行计量的,不管是预期的还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非指数化的个人所得税制都会对纳税人实际税负产生扭曲。假定个人收入按通货膨胀率增长,那么其实际收入没有变化。但是在持续性的高通货膨胀时期,名义收入的大幅上升一般会使应税所得额进入到更高的税率档次,增加税负。如果名义工资滞后调整,通货膨胀还会导致更多的税负增加。为了避免持续高通货膨胀个人所得税制的扭曲,一些国家对个人所得税制实行了指数化调整。实施个人所得税指数化需要考虑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具备统计属性良好的反映通货膨胀的 CPI 统计技术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持续性。

我国目前的 CPI 统计技术在衡量居民生活成本变化上存在较大偏差。近几年的房价飞涨使全国人民都在逐渐成为房奴。然而,这一点并未在 CPI 统计中得到充分体现。在 CPI 指数的分类商品权重中,居住消费权重严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